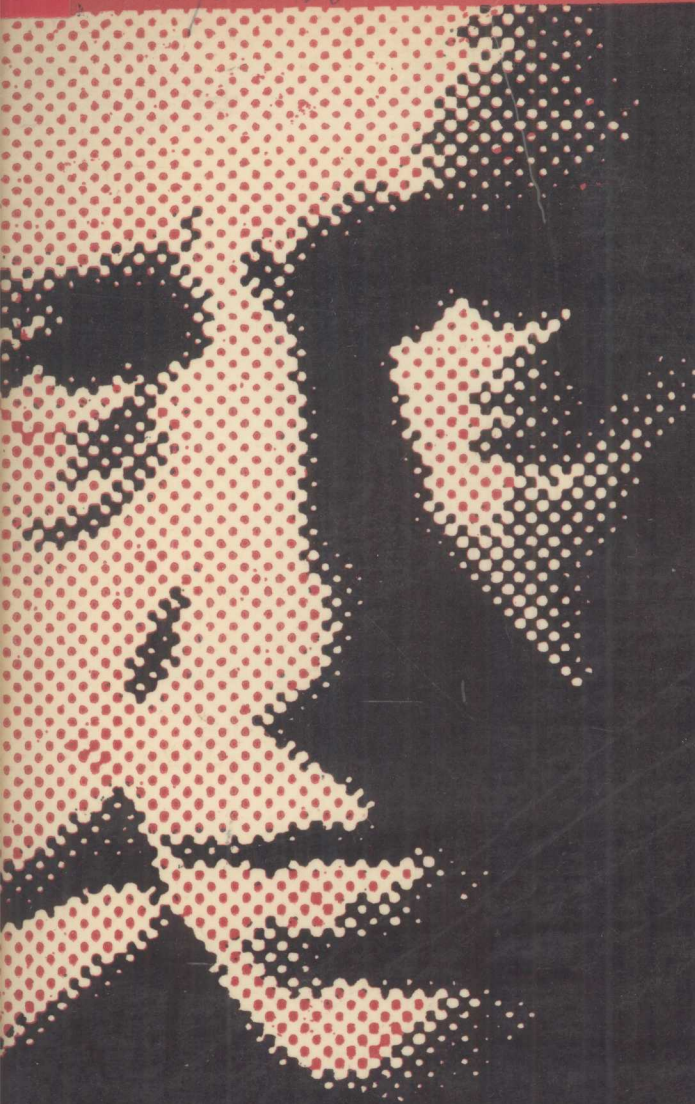


92.10.26

# 卢卡契谈话录



**Conversations  
with Lukacs**

卢卡契 著  
T·平库斯 编  
龙育群 陈刚 译

# 卢卡契谈话录

卢卡契 著      T·平库斯编

龙育群      陈刚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卢卡契谈话录

卢卡契 著 T·平库斯编

龙育群 陈刚译

责任编辑：唐维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75 插页：2

字数：116,000 印数：1—3,000

ISBN7-5404-0656-9

I·526 定价：3.00元

## 译 序

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卢卡契，是现代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他也参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但其业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卢卡契的名字，在我国也是早就相当熟悉的。理论界中年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早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卢卡契就被作为“修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而成为“大批判”的一个“靶子”了。可是，说起来叫人哭笑不得的是，那时在我国，尽管许多人在文章中或口头上，乃至在教材中，当要“联系实际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都会带上“卢卡契之流的修正主义”之类的词句，但真正读过卢卡契作品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我敢说，全部读过卢卡契著作的是一个也不会有，即使认真读过他的一两本代表作的那时也是绝无仅有。这倒不是因为理论工作者本身懒惰不读书，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条件读到。即使有个别人能接触到卢卡契的著作，但一般人却是无从问津的。对绝大多数理论工作者来说，那样的“批修”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所幸这种既可笑又可悲的局面终于结束了。今天我们已可以在书店里公开买到卢卡契的著作（虽然还很少），也可以公开阅读和评论他本人以及介绍他的思想的作品了，即使对卢卡契作出很高的评价，

也不至于被扣上“为修正主义张目”乃至被径直扣上“修正主义者”的政治帽子而受到迫害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则单单本书的能够公开出版这件事本身，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也就是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三大所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胜利的一个表现，因而是值得庆贺的。

本书是卢卡契晚年和霍尔兹、科弗勒、阿本德罗思等人的四次谈话，据录音记录整理而成的。它不能算是卢卡契的主要著作，但涉及卢卡契思想的许多方面；由于是用的谈话形式，所以该书很生动活泼，也比较明白易懂，不象其他理论著作那样晦涩枯燥，因此对想全面深入研究卢卡契思想的人它是一份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对初接触卢卡契的人也不失为可借以大体了解卢卡契思想的很好的入门读物。

卢卡契在这几次谈话中，从本体论到当前的具体政治问题，从古代斯多葛、伊壁鸠鲁派到当代的非理性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从美学、文艺创作方法到身边日常琐事，可说无所不谈，但又不是漫无边际，而是从各个方面表现了自己的一贯思想。卢卡契一生历经坎坷，其思想自然也有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早在二十年代的青年时期，他就曾因“左”倾思想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而从四十年代以后，他又屡次被指责为“右倾”，被当作“修正主义者”而受到大规模的批判和抨击。尽管这样，我们却看到，卢卡契始终表明自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事实上他也是始终力求以他自己认为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的。他并没有因为受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攻击就表明自己要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此可以说，卢卡契的一贯思想，就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他对各种各样问题的谈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阐发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当然，卢卡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认为他的全部观点中，肯定会有不正确之处。但这是毫不奇怪的。因此，如果说卢卡契的观点可能有确实错误的地方，那么，那些批判和攻击本身，也肯定并非完全正确。至于究竟谁对谁错，或谁的正确或错误的东西更多或更少，是应该就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归根到底是要由实践来检验，不能笼而统之，一概而论的。应该承认，同样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们之中，历来存在着、至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或学派，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而这也未必就是坏事，毋宁是符合事物本性的好事。那种认为只有自己掌握的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而与之不同的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应该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观点，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倒是真正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的。

既然如此，则阅读本书或其他同类书籍时，我们就既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认为全是正确的；也不能带着成见，把它当作“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来肆意挑剔，一概否定。只要我们能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善于独立思考，则当能作出恰当的辨别，吸取其中有积极意义的成份；同时对其错误或有缺点之处，也可汲取教训，受到启发，因而也是有益的。此外，对他的有些观点，即使不正确，也应该就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的具体条件或历史背景来加以理解和说明。这比加以简单的斥责好得多。我认为，在本书中所表现的下列一些问题上的思想观点，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并从中得到启迪的。

首先，例如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本体论”被看作仿佛只是一个旧哲学的用语，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除非论到旧哲学就很少用它，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不讲“本体论”的。在本书一开头就提出是否“真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这样的东西”的问题。而卢卡契从日常生活中就近取譬，说明每个人实际上都有他的“本体论”，他的一言一行也都无不是从某种“本体论”出发的。在我国，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其他没有”的观点也曾一度被奉为圭臬，而近来则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已不再被目为“异端邪说”了。要研究究竟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问题，至少可以从卢卡契的论述中受到一些启发。

其次，美学和文艺创作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当前是许多人感兴趣的热门话题。卢卡契有美学的专著，其思想在美学界、文艺界是有重大影响的。在这几次的谈话中也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虽不能仅仅据此来了解卢卡契的全部美学思想，但也可以从中知道一些他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这对于我们研究美学问题也是可资借鉴的。卢卡契与霍尔兹关于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区别的讨论，也是为关心艺术创作方法问题的人所感兴趣的。卢卡契认为，“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是美学中最大的对立”的观点，以及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而且也根本不是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官定的自然主义”（见本书第26页）的论断，虽不免有偏激之处，但也值得人们深思。

说到这里，就可以接着谈谈卢卡契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了。卢卡契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可说是不遗余力。至少在有些人那里，卢卡契之所以被看作“修正主义者”，大概

就正因为这一点吧。对斯大林是不应该全盘否定的，他使苏联作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屹立于世界上，并在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等方面都有其巨大的贡献，这是不应抹煞的。斯大林虽有缺点，但他总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所谓“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因此，卢卡契对待斯大林的态度，至少是难免过于偏激，失之片面。当然，由于斯大林的耽于个人迷信以及其他失误，对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危害，也决不能低估。其中有一些是客观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也决非与斯大林个人的过失及其性格上的严重缺陷完全无关。特别是由于斯大林的错误给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其严重性也许是我们难以深切体会的。而卢卡契不仅是个人深受过所谓“斯大林主义”之害，也痛切地感受到它对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因此，他对斯大林的这种激愤，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危害的严重性的认识。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赞同或全盘接受卢卡契对斯大林的观点和评价。

卢卡契诚然猛烈攻击“斯大林主义”，但我们在本书中也可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学说，则仍是十分推崇的。因此决不能因为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及其追随者就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他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态度，也许也和有些人不同。例如，卢卡契很重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他在揭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的思想方面是有特殊贡献的。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未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与他成熟期的思想不同，不能把他早期的思想看作就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但卢卡契则竭力反对把青年马克思和后期马



克思对立起来。象这类问题，我认为也只能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来解决的。

再者，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卢卡契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当代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所作的批判。他对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和“新实证主义”思潮都有精辟的分析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当代“新实证主义者”如卡尔纳普等人的思想，就其社会作用而言，看作可以与托马斯·阿奎那的正统的经院哲学和神学在中世纪的地位相类比。我认为，这一看法可说是别具慧眼，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通常往往以为新实证主义的哲学只是专心于探讨科学认识等问题，似乎是脱离政治的，而对于例如卡尔纳普，也“象托马斯·阿奎那在封建社会的某一阶段试图调和本体论、宗教、伦理学，把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要求总结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一样”，他“对当代的文化所起的作用就正是一种托马斯·阿奎那式的作用”（见本书第143页）这一点，是认识很不足的。应该说，卢卡契的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哲学中这一重要思潮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此外，在具体的政治领域，卢卡契主张“应该承认而不应该蔑视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所犯的错误，同时我们必须批判这种革命过程中的非人性的方面，但又不应该把它当作诽谤的借口”（见本书第136页）。这种态度应该说也是正确的，至少和那些对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所犯的错误采取嘲笑、攻击、诽谤或幸灾乐祸态度的人是大不相同、正相对立的。

本书的内容所涉极为广泛，不同的人在阅读过程中将会从中发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种种不同的题材和论点，例如我自己，作为一个以莱布尼兹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史工作者，就对书中关于莱布尼兹的评论深有同感。卢卡契认为“对

莱布尼兹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巨大的疏忽。莱布尼兹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有趣的人物，对他我们尚未作过任何理解的尝试”(见本书第14页)。这些就不在此一一论列了。

本书的两位中译者都是我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他们译完此书后要我看看译稿，并写一篇序。我一方面感到责任所在，难以推诿；另一方面也对此书内容颇感兴趣，愿意作它的第一个读者，于是虽工作颇忙，也终于答应了下来。只是因为时间仓促，不能全部校阅译稿，只能在通读的基础上部分地对照原文作了校阅，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就我所校阅的部分看，译者是努力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求得译笔顺畅可读的，我认为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读完译稿之后也觉得颇有些感想要说，就拉杂写了下来，权且作为译本的序。我的这些感想，既很肤浅，也可能有很多错误，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陈修斋**

1987年11月

# 序 言

G·卢卡契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影响在他的活动的不同时期都表现了出来。他的影响始于其早期著作《灵魂与形式》，由于受着生命哲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卢卡契尚未摆脱齐美尔（Zimmel）的痕迹。这本书属于德国当时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其社会方向尚不清楚。表现主义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接着，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了重要的论述。这本书影响了整个一代年轻的欧洲知识分子。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卡契写作了论辩性著作《理性的毁灭》以及同一思想脉络的其他有关文学史的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卢卡契从理性和启蒙的原则出发，发展了一种进步的斗争的立场以反对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主义和蒙昧主义。卢卡契影响的广泛性不仅在于他所创立的方法和他的洞察力，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激怒对方，并迫使对方澄清自己的立场的方法，这样，甚至在对方的反驳中（这些反驳把论战推到了适当的高度），卢卡契思想的洞察力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出来。

卢卡契是一个严谨的思想家。他的风格的一部分是，他的思想总是由一些具体的事例和身边的机遇引起的。因此，他的

著作的大多数都是有具体的研究的，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形成了一个圆圈。只是到了晚年卢卡契才能形成这一中心，即他的著作的哲学内核和他的思考的明确对象。他的整个哲学仍是杰出的，其首要部分是两卷本的《美学》的第一部分，其次是《本体论》。

编者编辑本书的意图是，希望该书能有助于为卢卡契著作的读者指出一些初步的、暂时的研究这一中心的方向。卢卡契的概念都是植根于、并建立在这一中心的。可以说，我们应该通晓这位学者的写作过程，这样才有助于探究他的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把它展示给广大的读者。那些重要的思考和推论，在谈话的形式中可以转变成一种较简单的阐释。录在录音带上的谈话对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来说负担会轻些，而且比起写一篇介绍他的基本思想的短文来说，也会较少妨碍他的主要工作的进程。因此这意味着卢卡契可与三个对话者讨论本体论、政治学和意识形态批评等问题，用这样一种方法展示出他的有创见的工作的主要要素的内在联系。

谈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更深刻的长处是可以保持表达的生动性，而这种生动性在把言谈转述为书面语言时是不可避免地会失去的。卢卡契是匈牙利人，他的口头表达方式在无拘无束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冲动的和激动的德国人的气质，因而错误是难免的。而在他写作的时候，这种泉涌般的语言之流就被复杂的结构优雅的句子所控制与取代，文章体裁则得到科学证明的方式——因而口头表达的无所顾忌的随意性方面就失去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用自己的母语说话和写作的时候都有这种共同的体会。谈话可以保持表述的生动性，并且可以显示出一种思想开始是怎样出现的，以及这种思想的意思的某些方面如何逐渐

扩展开来，然后又汇合在一起重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的。其目的并不是论述的精确性，而毋宁是原始表述的资料价值；同时也不会有什么论辩之术，而只有对有关问题的普普通通的研究。

卢卡契在谈话时思想极易爆发，一个很小的刺激、一点思想的闪光，就足以点燃其思索和联想的导火索。事实上这是由于他有一种来源于经验的丰富知识所造成的，一旦他的思想被激发起来就无法遏止。任何一个与他交谈的人都首先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我们坐在他位于多瑙河畔宽敞的寓所里一张堆满着饮料和糕点的桌子旁，一边是多瑙河的景色，另一边是城堡的风光，而我们身后则沿墙排列着许多书籍，一直摆到高高的天花板上。这是一个学者的寓室，其风格与奥匈帝国的古老气氛完全一致，这种风格甚至在今天也仍是布达佩斯的标志；尽管现在充满于这种“外在形式”中的内容是不同的。这个城市的人民具有一种有教养的、温文有礼的、待人平等大方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法国人的描述中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布达佩斯和巴黎之间存在一种有选择的亲和力，这一点甚至在卢卡契的思想和谈话中也表现了出来：他的思想表现了他的讥讽和机智，容不得任何混水摸鱼的阴暗想法，支配着他的思想的是笛卡尔主义的清楚、明白这一诫律，对这条诫律来说，任何真实的陈述，不论其多么微小也比最高级的——但却是无根据的神秘主义的光辉更可取。

因此，卢卡契不容许有任何含糊不清的东西。在他所猛烈抨击的新实证主义者中，他认为只有维特根斯坦才是真正重要的哲学家，这肯定不是偶然的。维特根斯坦说：“真正说来哲学的正确方法当如此：除了能说的东西外，不说什么，也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東西外，不说什么；

于是当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总是向他指明，他并没有赋予他的命题中的某些符号以意义。”这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排除，正是卢卡契自己的精神。能够用一种非形而上学的陈述来表达的正是他所谓的“本体论”的特性（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一再谈到了“本体论”问题）。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恢复“本体论”的术语和主题才是允许的，有意义的。

在卢卡契的思想中因而存在一种基本的经验主义，这一点在谈话中比在理论阐述的高度抽象中表现得更直接。这些谈话非常清楚地表明抽象的基础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由人们与现实世界打交道所提供的资料，在卢卡契的“本体论”中，正如在他的美学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起了一种基本的、在方法论上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赋予了我们与卢卡契的这些谈话以远远超出收集轶事的价值；因为在谈话中思想用以产生的直接方法与经验的最初水平、日常现实的资料——卢卡契强调这些东西的理论的贴切性——是确切一致的。

在把谈话整理成文时，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保持口头语言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要避免使卢卡契生气勃勃的言谈毫不逊色也是不可能的。卢卡契谈话扯得非常广泛，经常没有断句和停顿，因此我们不得不按句法把他的谈话适当地组织起来使其具有可读性。对听者来说，在生动交谈中相当清楚的一些东西，而对读者来说，由于书面语言的中立无倾向性语词，就可能使其混淆不清。尽管如此，原文的编辑准备还是不得不小心地不改变卢卡契谈话的具体特色：段落式的长句，思想的生动的连贯性，不断的离题以及后来又回到基本主题，整体的深远意义。我们上面提到卢卡契的经验主义，决不是说他缺乏辩证法。这一点有充分的语言学论据：冗长而复杂的句子只是为了

不仅仅从一个方面，而是要从多方面抓住它们的对象，含有“Wobei”（连接词）的辅助从句，以其限制性的、修饰性的和相对性的否定对一种思想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些复杂的句子在转译时不得不把它分解开来）。卢卡契还把单个问题的相对要素对立起来，这以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为标志，并且他也用同时起分开和连接作用的标点符号，特别是冒号和破折号来连接一种思想。这样一些风格的独特性表明，卢卡契思想的涌现尽管看起来无拘无束，但事实上仍然连续地保证了现实的多方面的丰富性本身。当他的思想紧盯着一个目标时，也还总是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如此便注意到了个别对总体的中介，而这就具有了辩证方法的本质。

这些谈话所追求的目的是为对卢卡契的研究提供一种纪实性的资料 and 了解卢卡契思想的初步知识，其所企求的是使这些谈话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的活生生的思想的一种见证，并以可能的最简便的方式提供接近这一思想的机会。卢卡契在连续四天的时间内以不知疲倦的热情为这些谈话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在本书出版之前再次对它作了检查，对此，我们深表谢意。卢卡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精明的对话者、一个热心的主人和朋友，对他，我们是衷心感谢的。听他谈话“既荣幸又有益”。

W·阿本德罗思

H·H·霍尔兹

L·科弗勒

T·平库斯

## 目 录

译序	陈修斋( 1 )
序言	( 1 )
第一次谈话：存在与意识	( 1 )
第二次谈话：社会与个人	( 31 )
第三次谈话：科学的政治学诸要素	( 72 )
第四次谈话：小结	(109)
附录：	
I：卢卡契生平及其思想	(147)
II：卢卡契简历及其著作	(161)
译后记	(166)



## 第一次谈话

(卢卡契——汉斯·海因茨·霍尔兹)

# 存在与意识

霍尔兹：卢卡契先生，在您的《美学》中，您使用了一套本体论的设想，对这些设想您并没有在所有的地方都予以详细的论述。当然，我们知道您正在从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本体论》一书的写作，该书仍是有待我们去拜读的，因此我们不想对它进行评论。然而，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个问题，即您的美学中的某些观点是如何受本体论的设想所制约的，以及这些观点将如何用这些设想来予以处置。这次会谈我们或许多多少少能弄清楚一下这些设想的含义。由此就产生一个初步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就从这个问题的谈起。它在当前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是我在马堡参加阿本德罗思先生的学生们的一次讨论会时提出来的。阿本德罗思先生现在就坐在我们旁边。

“真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这样的东西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体论’一词能有什么意义呢？”参加讨论会的阿本德罗思先生的学生们对我关于马克思主义把本体论归结为社会学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本体论范畴只能被理解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范畴。但是，如果本体论自身要具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这